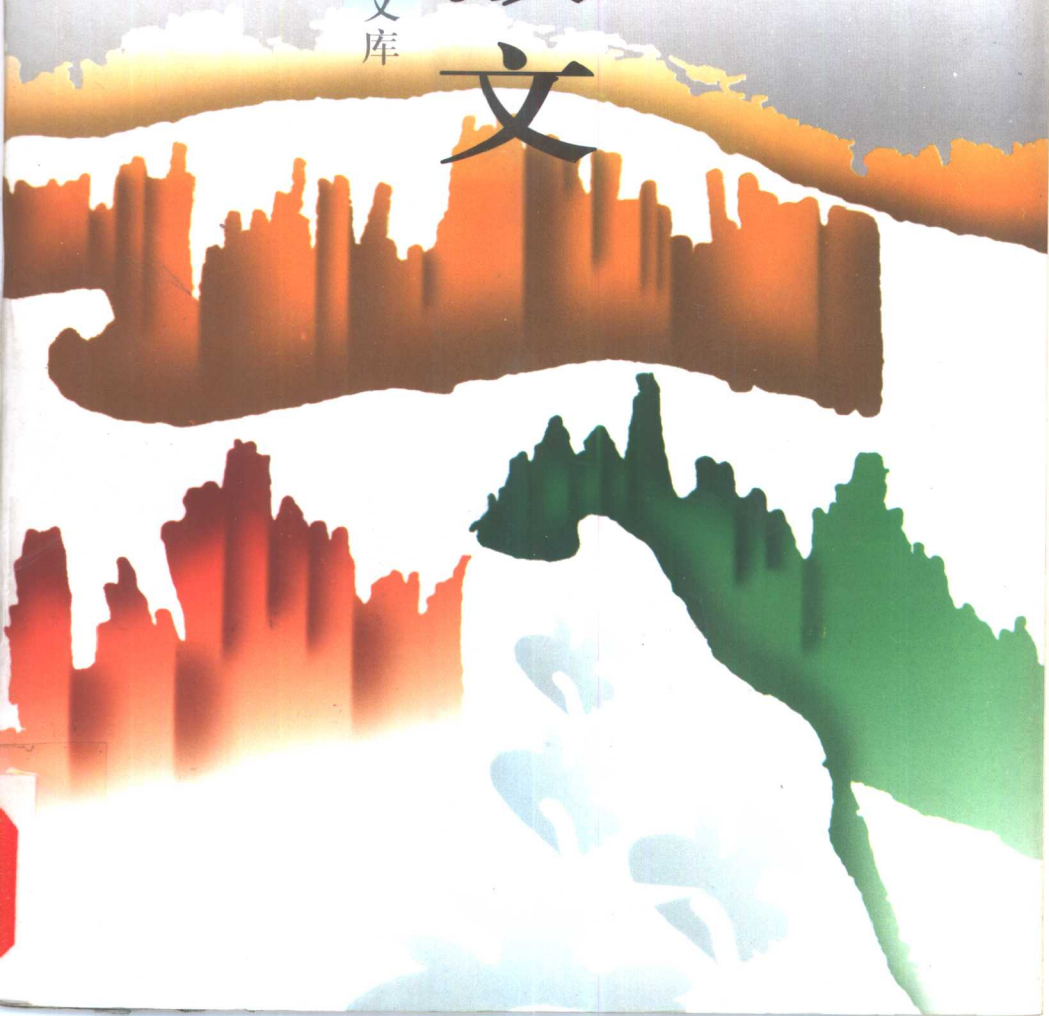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韬奋散文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徐行 章镇 选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韬奋散文

徐行 章镇 选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韬奋散文/徐行, 章镇选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9

ISBN 7-5043-2897-9

I. 韬… II. ①徐…②章… III. ①邹韬奋-散文-作品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1144 号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韬 奋 散 文

徐行 章镇 选编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23.75 印张 插页 3 571 (千) 字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9.50 元

ISBN 7-5043-2897-9/I·394



韜奮像

1895—1944



韬奋主编的报纸和刊物

韬奋的部分著作





1924年
韬奋在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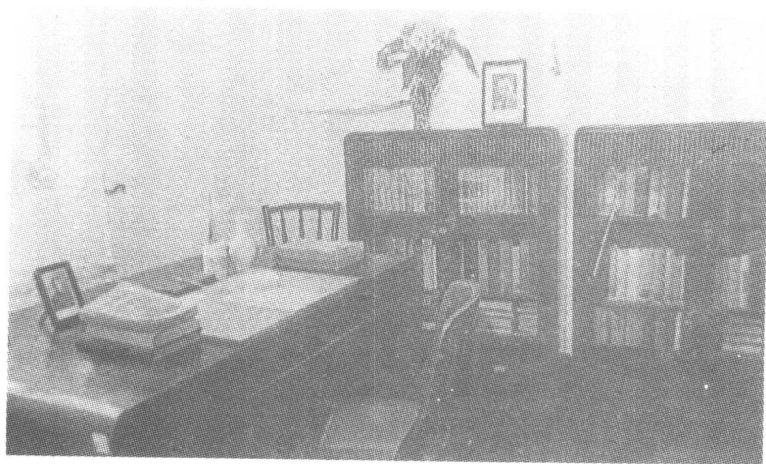
1937年韬奋在狱中读书、写作。



韬奋和夫人沈粹缜(1926)



韬奋纪念馆与故居书房



序



在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邹韬奋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我曾经说过：“我怀着十分钦佩和景仰的心情来纪念韬奋同志。我是受韬奋同志主办的《大众生活》的启蒙而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一代人中间的一个，尔后又踏着韬奋同志的足迹投身新闻事业……他不但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老前辈。”

韬奋同志是我国一代新闻界的杰出代表。他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奋斗终生，在艰难岁月里创造了伟大的业绩。他的炽热而忠诚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尚的思想情操，优秀的道德品质，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鼓舞、教育一代又一代青年，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奋发前进的思想动力。

当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跨世纪的宏伟纲领，要把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应该结合当前的思想实际和社会实际，学习、继承、发扬韬奋同

志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

我们要学习韬奋同志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增强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自觉性。韬奋同志生前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站在时代的潮头，不断以进步的思想观点唤起民众。他主办一个又一个刊物为祖国的前途，为民族和劳苦大众的解放，奔走呼号，全力抗争，不顾个人得失生死，“一息尚存，决不罢休。”我们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时代的潮头，为中华的振兴，为祖国的富强，为人民的幸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鼓与呼。要坚持新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使我们的新闻更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服务。

我们要学习韬奋同志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韬奋同志提出“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原则，竭其智能为读者“尽忠代谋”。他以“愚诚”、“愚忠”表达他的赤诚心愿。他主办的刊物《生活》、《大众生活》、《全民抗战》等等，适应时代的进步潮流，反映人民的正义呼声，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今天的新闻工作者要为人民服务，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人民、热爱人民，拿出讴歌时代主流、反映人民意志的佳作。

我们要学习韬奋同志“乐其业”、“负其责”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增强新闻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认真作风。韬奋一生都在实践他提出的“乐其业，尽其职，负其责，精其术，竭其力”的工作准则。他亲自撰写大量时评、评论、论文和通讯，认真编辑来稿，讲究版面安排，力求图文并茂，以处理大量读者来信为乐，还认真校样。他说：“我的目的，要使他没有一个错字。”我们要学习韬奋同志“乐其业”的思想，敬重我们的职业，热爱新闻工作，做到对社会负责，对受众负责，尽心竭力做好每件工作，把

品质精良、制作精细、没有差错的新闻作品奉献给读者、听众和观众。

我们要学习韬奋同志不断追求、努力进取的精神，增强新闻工作者的创新意识。韬奋同志说过，办刊物“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精神”。他随着时代的前进，斗争任务的转换，不断推出新的刊物，提出新的观点，写出新的作品。处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我国新闻工作者，更应该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不断进取，努力创新，以新的思想、新的作品、新的方法方式，反映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推动社会不断前进。

我们要学习韬奋同志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乐于清贫的高尚品格，增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抵制不正之风的侵蚀。韬奋同志反复提倡大公无私，在写文章时如此，在经营中亦如此。他以“在艰苦困难中奋斗”为荣。他常常在“贫民窟中办报”，一间简陋的过街楼、三张办公桌，就办起了《生活》周刊。他的夫人沈粹缜常常为吃、用发愁。但韬奋同志为了事业，乐于吃苦，忍受清贫。他说：“我始终未曾梦想替自己刮一些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工作条件、生活待遇，与韬奋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艰苦奋斗的精神，抵制金钱利诱的意志品质，确有大大发扬的必要。

今天，继《韬奋全集》出版以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又编辑《韬奋散文》出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本简明的韬奋作品的读本，这是十分可喜的。

韬奋作品永垂不朽！韬奋精神永生！

1996年4月

编者前言

1936年10月22日，在上海各界公祭文化革命旗手鲁迅的大会上，邹韬奋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这个演讲十分简短，却意味深长。他面对着送葬的人群说：“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鲁迅先生：许多人是战而不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

“战而不屈”是鲁迅战斗一生的高度概括，也是韬奋光辉一生的写照。邹韬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和建立民主政治，为中国的进步文化事业奋斗了一生。他一生站在“大众的立场”（韬奋语，下有引号除注明者，均为韬奋语），站在时代前列，引导人民走向真理，走向光明。他一生六次流亡，一次坐牢，“题破稿纸百万张，写秃毛锥十万管”，始终坚持斗争，没有一天不是拿着笔在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1895年11月5日，邹韬奋生于福建长乐县，祖籍是江西余江县。他的家庭是一个破落的官僚地主。祖父、父亲都在福建做官，韬奋的童年是在福州度过的。他五岁入家里的私塾，读了很多经书，打下了古典文学的基础。他的父亲深受实业救国的影响，很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工程师。1910年春天，韬奋结束了家塾的学习生活，进入福州工业学校。两年后，父亲又送他进入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在南洋公学，他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1913年当他由附小升入附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失业了，家庭

经济发生了困难。他必须争取前三名，获得“优行生”的资格免除学费，减轻家庭负担。韬奋日夜苦读，年年都是“优行生”，为了筹措学费以外的其他费用，他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向报刊投稿，换取微薄稿酬，每逢暑假还给人家当家庭教师。但韬奋对当工程师并不热衷，从小学开始他就对历史和国文有浓烈兴趣。他十分喜欢上海《时报》上黄远生的文章，一心想当黄远生这样的新闻记者。

1919年，邹韬奋从南洋公学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由工科改读文科，以实现他当新闻记者的愿望。他主修西洋文学，副修教育。课程的烦闷没有了，但经济的窘困更加严重。他除了为报章杂志写稿，换取稿酬，还在学校图书馆当助理员，给人家当家庭教师，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学业。为了完成学业，他还欠下了三百元的债务。

圣约翰大学毕业后，邹韬奋没有立即实现他做新闻记者的愿望。他先进了上海纱布交易所当了英文秘书。后来由黄炎培的介绍，进入了由他参与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后来又担任了中华职业学校的教务主任和英文秘书，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和职业教育丛书。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工作十分勤奋。他编译出版了《民主主义与教育》、《职业教育概论》、《职业教育研究》、《职业指导》、《职业心理学》等著作，还参加了职业教育社的职业指导运动，到过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调查，了解职业教育的状况。

1926年，是韬奋生活转折的一年。这一年的元旦，他和沈粹缜举行了婚礼。沈粹缜是个贤慧的女子，曾任苏州女子职业学校美术科主任。结婚后，她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变卖掉自己的首饰，在上海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从此，沈粹缜伴随着韬奋度过他奋斗不息的辉煌一生。

这一年，韬奋的事业也出现了转机。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黄炎培提名，邹韬奋担任了该社《生活》周刊的主笔，实现了他多年来梦想从事新闻工作的宿愿。

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立志改革版面，充实刊物内容，将一本对社会青年进行职业教育的小杂志，办成了受青年欢迎的综合性杂志。这期间，韬奋倾注了全部精力，化费了无限心血。为了广泛联系读者，他在杂志上开设了“读者信箱”，信箱中的文字，选辑成《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悬想》两本集子，还从刊物没有发表的复信中选辑了《该走那条路》、《迟疑不决》、《迷途的羔羊》三本信箱外集出版，广为流传。在中国新闻史上，没有一个记者像韬奋那样“随读者的歌泣而歌泣，随读者的喜为喜”。

韬奋曾经说过：“任何事业的成功史必有一段伤心史。在创业时期必须靠自己打出一条生路来，遇到困难除迎头搏击，别无他法。”他办《生活》周刊正是用的这种迎头搏击困难的精神。当时，《生活》周刊只有两个半人。韬奋一人用了许多笔名，每个笔名写一种文章。如“因公”这个笔名，专门用来写作阐述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文章。《生活》周刊曾系统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这在中国期刊史上是开创性的。“心水”这个笔名，是韬奋用来写作人生修养的，诸如恋爱、婚姻、求学、失业、理想等等。这些文章没有空洞的说教，更无教师爷的训斥，常常循循善诱启迪青年的心灵，同情他们的遭遇，给以正确的引导；他还用“落霞”的笔名，介绍评述世界各国的名人。他系统介绍了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甘地，大发明家爱迪生、诺贝尔，大科学家巴斯德、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凡是对本民族独立、对世界人类作过重大贡献的人，他都一一予以评述，赞扬他们对事业的献身精神，赞扬他们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文章抓住了

青年读者的心，文中洋溢着作者鼓舞青年奋发向上的拳拳之心。在读者的心目中，《生活》周刊成为主持社会正义和公道的舆论机构。发行量节节上升，三年时间由接办时的二千余份，增加到了四万余份。随着《生活》销路的增加，社会影响的扩大，韬奋的声誉也与日俱增。韬奋不但没有飘飘然，反使他颇感不安。于是，他用韬奋这个笔名来警戒自己。对这个笔名，他做过一番解释：“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我改名的原意盖于此。”

“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顺应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韬奋痛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看到了祖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生活》上，他大声疾呼，吁“请国人严重注意亡国条件的惨酷内容”，他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主张“全国上下，一致团结对外”。他利用刊物，号召读者捐助东北义勇军喋血抗战，宣传中国军民的英雄抗战，揭露敌人的侵略罪行。“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韬奋再次通过刊物号召读者援助十九路军，还以刊物名义开设生活伤兵医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

鲜明的抗日旗帜，使《生活》得到国人的信任和热爱，因为《生活》是他们的喉舌，道出了他们的心声。《生活》发行量增加到十五万份，这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是少有的。而这一切却遭致了国民党政府的忌恨，他们对邹韬奋散布流言蜚语，肆意中伤。他们污蔑他侵吞巨款，给《生活》加上“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邮递。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韬奋预感到了《生活》被封已不可避免，遂与胡愈之等商议，使《生活》周刊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免受牵连。为了保存实力，将《生活》周刊改组为生活出版合作社。这样，一旦《生活》被禁，生活出版合

作社可继续营业。1933年底,《生活》周刊被迫停刊。而生活出版合作社早已在1932年7月正式开张。对外,称为生活书店。生活书店后来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堡垒,出版了许多进步文艺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表》,郑振铎主编的大型杂志《文学》,胡愈之主编的《世界知识》,陈望道主编的《太白》,鲁迅、茅盾主持由黄源主编的《译文》,陶行知主持由戴伯韬主编的《生活教育》,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这些在30年代发生重大影响的进步杂志,都交由生活书店出版。此外,生活书店还出版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一套《青年自学丛书》。韬奋自己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也由生活书店出版。这本被鲁迅先生称为“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曾重印六次,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

1933年初,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受到通缉。韬奋也上了“黑名单”,受到特务盯梢。为了他的安全,朋友们都劝他出国暂避。

1933年7月,韬奋离开他日夜为之奋斗的祖国,从上海乘意大利邮船到达威尼斯,继而又到达罗马、日内瓦、巴黎、伦敦。以后又访问了德国、比利时、荷兰、苏联和美国,除了日本,他几乎走遍了当时的发达国家。1935年8月回到上海,前后历时两年多。

韬奋所以走遍那么多国家,因为他想利用这次流亡,观察世界的发展趋势,寻找中国民族的出路。他利用一切机会学习革命理论,实践的考察和理论的探索,同时并进。他前后在伦敦住了一年多,利用大量时间在大英博物馆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来

还到莫斯科暑期大学和美国大学生一起学习革命理论。把沿途的见闻随时写下，寄给国内的杂志发表，从未停止他手中的笔。由于远离祖国，他无法写作时评、随笔、杂感等切中时弊的文体，而是利用考察游历的机会，写作长篇记游体报告文学，这些优美的散文后来结集为《萍踪寄语》一、二、三集和《萍踪忆语》一集出版。这些散文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视野十分广阔。由于报道客观、文笔生动，读起来令人兴味盎然。这些作品使中国人民看到西方世界的真实情况，看到了西方的繁荣，和在繁荣后面的大规模的贫民窟，看到了伦敦街头的叫化子，巴黎街头的妓女以及德国法西斯分子对无辜人民的种种酷刑。韬奋每到一地对当地华侨、华人予以极大关注，同情他们的遭遇，痛感祖国衰弱给他们的儿女带来的不幸，流露着一个爱国者的心声。

1935年8月，韬奋由美国返回上海。他下船后来不及赶回家，就前往监狱探望《新生》杂志主编杜重远。杜重远是他的好友，也是事业上的同志。《生活》被封以后，他马上办起《新生》杂志，继续《生活》的方向，实际上是《生活》周刊的复活。后来《新生》杂志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不料这篇经国民党当局审查过的文章刊出后，日本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提出抗议。结果《新生》杂志被封，杜重远被捕入狱。韬奋的探视，极大地鼓舞了杜重远。他在狱中继续写作。1936年，韬奋为他编辑出版了《狱中杂感》，还为该书写了序。

回国以后，韬奋决心创办一个新的刊物，以继承《生活》和《新生》的精神。经过短期的紧张筹备，新刊物《大众生活》诞生了。邹韬奋兼任主编和发行人。《大众生活》以“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为三大目标”。《大众生

活》贴近大众，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线，热烈地声援和支持了当时发生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深得读者喜爱，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二十万份。

1938年12月，上海市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邹韬奋被选为执行委员。韬奋的爱国行动和《大众生活》的巨大影响，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他们威逼利诱，先是由两个特务头子——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和宣传部长张道藩出面，找韬奋谈话，以死恫吓他停止抗日救亡宣传，遭到拒绝后又由“上海闻人”、流氓头子杜月笙出面担保，要韬奋到南京和蒋介石面谈，机智敏锐的韬奋当然不会上当。《大众生活》被迫停刊。此时的韬奋，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大众生活》的最后一期，他公开表示：“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前进。”他接着创办了《永生》周刊，但《永生》周刊不久又被封。韬奋已无法在上海继续待下去，只得再次出走香港。

他一到香港，就利用当地的特殊条件，在朋友的支持帮助下，很快办起了《生活日报》和《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但香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毕竟不宜办全国性的报纸。五十五天后，宣布移到上海出版。国民党政府当然不会准许《生活日报》在上海出版。不得已，韬奋将《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为《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出版。

1936年11月22日，韬奋和救国会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突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中共中央立即通电营救，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宣称：“爱国